

食品安全多主体共治交互机制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张利国, 黄禄臣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食品安全是民生问题, 多主体交互共治是食品安全问题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通过研究我国食品安全管理政策的演变和现有食品安全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发现食品安全共治涉及多个主体的动态交互, 面临单个主体参与的意愿低和多主体交互的效率低两个方面的困境。政府、消费者、企业、行业协会、媒体面临形式主义、低成本投机、维权意识低、缺乏内部机制、短期逐利等问题导致单个主体参与共治的意愿下降。进一步对主体之间交互方式的研究发现多主体交互面临利益驱动、信息不对称、权责混乱等问题。通过分析食品安全共治多主体交互机制的可行性, 从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主体积极性、提升主体公信力等三个方面提出九点相关对策, 以期能够实现食品安全治理长期化、常态化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食品安全; 多主体; 交互机制; 社会共治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3)01-0012-10

一、问题的提出

“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和国民身体健康的大事, 世界各国均高度重视。21 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提高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度, 涉及到酒类、肉类、粮食等多个种类, 引发了各界的密切关注^[1]。为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水平, 各级政府采取大量措施对监管模式和治理路径进行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 到二〇三五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要不断地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 “多元治理”理念被引入食品安全治理, 为传统一元监管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可行路径。“多元治理”主要包括政府、行业协会、消费者、企业和媒体等五个主体, 分别在法律制度、行业准则、供求侧、社会舆论等方面扮演不同角色, 共同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但是, 在实际过程中, 各主体间存在相互推诿、“姿态性”回复、过度警惕等问题, 导致多主体交互效率低下, 食品安全问题无法有效解决, 亟需构建多主体交互机制进行主体间协调。

食品安全治理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相关研究分别从食品安全治理转型的必要性和食

[收稿日期] 2022-10-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73054)、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ZXQH07)、南昌市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项目(ZDSK202202)。

[作者简介] 张利国(1977—), 男, 湖南南县人,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与农业经济; 黄禄臣(1998—), 男, 安徽滁州人,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品安全共治的可行性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第一,部分研究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模式面临转型。有学者认为传统政府监管模式存在资源稀缺性和执法负荷较重两大问题,导致企业投机行为的机会成本降低,因此法律颁发的数量和食品安全治理的效果并不存在正向关系,即政府直接管辖的模式面临转型需要^[2,3]。例如,印度在食品安全方面颁布了较多法律,但是食品安全问题实际上比埃塞俄比亚更严重,这种反常现象也符合受粮食安全挑战的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4]。第二,有关食品安全共治的研究认为多主体共治是食品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未来方向^[5]。部分学者认为食品产业链上的成员积极响应监管要求、行业惯例和社会规范,对食品安全进行负责会提高食品安全的概率,因此在长期中形成食品安全治理共同体是可行之举^[6]。还有学者认为网络的发展可以帮助食品安全问题的源头追溯,通过将多个主体纳入治理体系中可以结合源头治理和全程监督实现食品安全治理模式转型^[7-9]。此外,有关食品安全共治困境的研究发现目前政府工作推诿^[10]、媒体错误报道^[11]、治理主体社会信用低^[12]等问题是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的困境。为解决食品安全共治面临的问题,部分学者提出信息公开^[13]、组建供应链^[14]、引导公众参加共治^[15]、提高行业自律性^[16]、推动压力传递给企业^[17]的“政府+多主体”协同共治模式可以提升共治效果。

综上所述,治理主体多元化是食品安全治理未来的必然趋势。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内涵、特征是什么?食品安全多主体交互机制有哪些?多主体如何有效共治?本文通过分析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治理困境以及交互机制建立的可能性,探索出政府、企业、消费者、行业协会以及媒体交互机制的优化策略,以期更好地解决食品安全共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参考和支撑。

二、食品安全共治的内涵与发展

(一)食品安全共治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指出食品安全即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我国食品安全的标准体系来自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推行的 HACCP(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体系,具体是对食品中所包含的微生物、化学物和物理伤害进行控制以保障食品安全达标。食品安全共治的实质是社会共同治理,以多主体共同参与替代政府的全权主管,通过相互监督、相互配合在食品的产购储加销等环节进行监管,逐步消除食品安全风险,具有主体多元性和内容复杂性两大特征。主体多元性是指参与事务的主体包含消费者、企业、政府、媒体、行业协会等多个主体;内容复杂性是指在不同环境、不同环节、不同主体的情况下,食品安全治理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性。有学者认为,共治属于公共治理但不等同政府治理,应重视各主体间的平等对话、重视市场的基本地位和社会治理的价值,通过主体之间资源和利益的交换进行协同,寻找“政府失灵”的解决策略^[18,19];也有学者认为,共治是指在法律范围内各自使用权力参与治理,打破传统政府全面监管的模式,以社会力量的加入弥补政府资源有限的短板实现社会共同利益^[20]。总体而言,食品安全共治内涵涉及政治、法律、市场、经济多方面,在实际过程中随着社会发展需要不断演变。

(二)食品安全治理的发展与模式

食品安全共治是社会治理模式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作为一个食品消费大国,我国为保障食品安全做出了大量的探索,食品安全管理政策不断完善和演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食品安全治理

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1949—1977年解决温饱问题的初期阶段、1978—2002年解决卫生问题的发展阶段、2003—2012年解决治理体制的提升阶段、2013年至今解决高质量问题的攻关阶段^[1,21]。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里程碑如表1所示。

表1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里程碑

时间(年)	法律/条例	主要里程碑
1965	《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	第一部食品安全领域的法律法规
1983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	单一部门监管模式形成
1995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	单一部门管理进一步加强
2004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	多主体治理理念初现
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卫生理念向安全理念的转变
2013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	食品安全共治格局形成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修订)	食品安全治理进一步强化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修订)	食品药品分开,职能进一步划分,食品安全治理不断完善

1965年颁布的《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是我国史上第一部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开启了我国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里程碑。1983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首次将安全卫生的工作划归到卫生部门,由政府统一管理的模式形成。199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开始实施卫生监督措施,卫生部主管全国的食品卫生问题,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部门对辖区食品卫生行使监督职责。该法案属于政府统一式管辖模式,对食品安全未做出定义,未涉及行业协会、媒体等主体的监督条例。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实行“以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决定》提出几项重要措施,提出一个环节一个部门负责的规定,共设有农业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卫生部、商务部五大部门;地方责任归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了五年内逐步构建食品安全信用体系框架的目标,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作用。《决定》使得监管体制有了进一步的完善,提高了对其他主体的关注度。至此,“多主体治理”理念出现在了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内容中。2009年全国人大第七次会议通过并颁发《食品安全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食品安全定义;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综合协调食品安全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辖区食品安全进行管理;提出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制度,同时对行业协会进行了法律明文规定。2013年国务院职能机构改革,对质检总局、工商总局进行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食品安全监管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至此,我国食品安全共治的格局正式形成。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强化了企业的“主体责任”,提出企业应当建立追溯机制。地方政府将食品安全建设纳入地区规划,管理支出纳入经费预算,建立分类分级的监督制度;提高行业协会的代表性,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指出“四个最严”,对失信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和监管。2018年我国对《食品安全法》再次进行修订,将“食品药品”改为“食品”,进一步重视食品安全的问题;同年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进一步进行职能划分。至此,我国食品安全共治理念不断完善,向食品安全高质量发展迈进。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历史演变反映了食品安全共治理念趋向成熟,但是改革和完善主要集中于政府部门,社会主体之间交互模式的发展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从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到处理完成大致经历三个环节。第一环节是反馈环节。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选择公事公办或者私

下解决。如果公事公办,消费者向政府、行业协会、媒体进行反馈,进入第二环节。第二环节是溯源环节。食品安全治理的主体主要是各级地方食品监管部门,食品监管部门依据反馈结果进行监测审核和问题溯源,对溯源结果得出初步结论,进入第三环节。第二环节除了政府主体,还有媒体和行业协会的参加,媒体通过披露报道、行业协会通过调研指导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监督。第三环节是处理环节。如果明确食品安全问题是生产者的问题,则对生产者进行处罚并向消费者进行反馈,最终完成整个治理过程。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食品安全治理过程涉及主体众多、响应路径长,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提升食品安全发生的概率,如果缺乏合理的主体交互机制,食品安全治理会存在工作重复、效率低下等问题。从食品安全共治主体构成出发,多主体交互机制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单个主体参与共治意愿低和多个主体之间交互效率低两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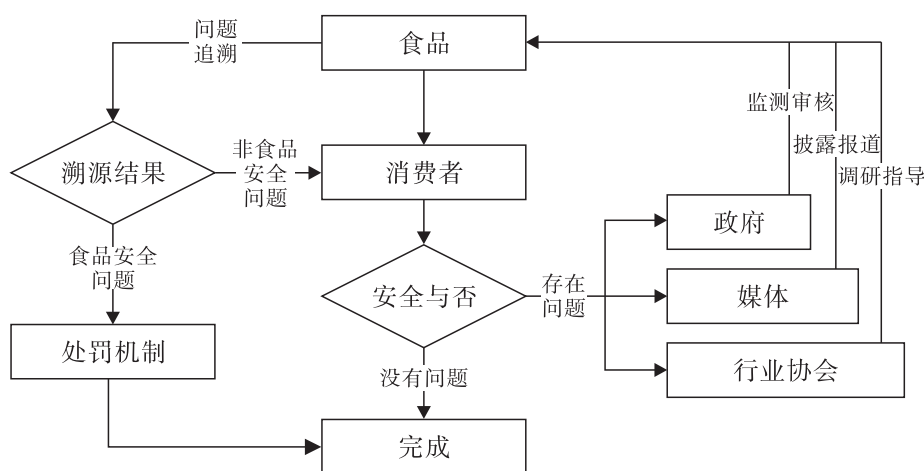


图1 食品安全治理流程

三、食品安全多主体共治的困境分析

(一)单个主体参与共治的困境分析

食品安全涉及领域广泛,生产、检测环节具有技术门槛,因此食品安全的治理需要整个交互体系的配合且主动。但是,实际上各主体是否愿意主动参加食品安全共治存在现实阻碍,并且由于各主体承担的社会角色不同,面临的困境也不同。食品安全治理承担的主体角色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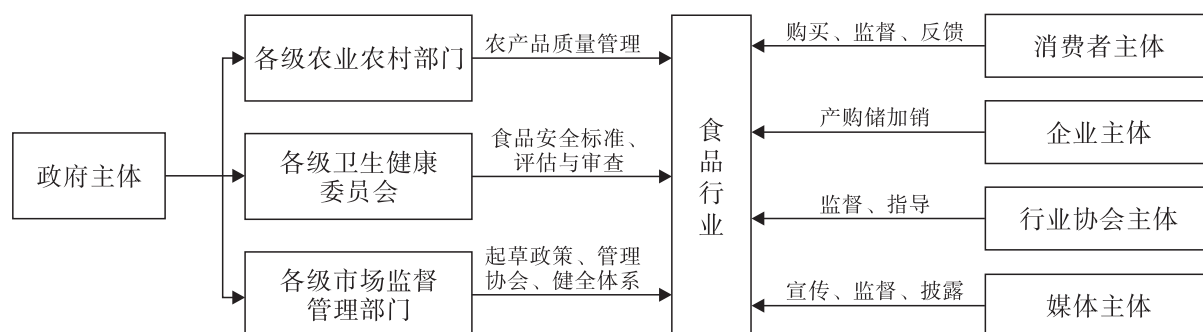


图2 食品安全治理主体角色

(1)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作为传统监管过程中的领衔方,主要存在形式主义和绩效模糊两个方面的问题。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实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制”。从国务院

到省市再到县区,责任层层下放,基层干部具有的监督权大于治理权。传统随机抽检模式会产生投机性行为,并且容易产生“漏查错查”的现象^[22,23],问题出现时由高层领导“挂帅督办”专项治理,表现出强烈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治理的整个过程程序复杂、耗时长,治理效率低下,并且会降低政府部门的社会信用程度。此外,食品安全共治过程需要联动多个管理部门合作,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投入,但是事后“功绩”属于牵头部门,在部门之间无法公平分配,存在部门争夺“成果”的现象,不利于提高政府参与共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4]。

(2)企业

生产企业作为监管过程中的被监管对象,逐利性与自律本质之间的矛盾是企业参与共治所面临的困境。企业作为食品的供给方,应秉持高度自律要求,但是在具有垄断竞争特征的食品行业获利较难,企业为提高盈利而降低生产成本,不注重食品治理将提高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概率。食品行业中的企业基数大、种类多、规模差距大,追求短期市场份额的企业为提高市场利润降低食品制作标准,获取预期利润后退出市场,对食品安全构成巨大隐患。此外,追求短期利润的企业成本普遍较低,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优质企业被迫退出市场,不利于食品行业的未来发展。

(3)消费者

消费者作为食品安全共治的受益方,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意愿理论上最高,但现实中面临辨别能力低、维权意识不足的困境。大部分消费者缺乏专业知识储备和自我保护意识,普遍存在“吃不死人”“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等观念,对食品质量的辨别能力不足,导致鸡西“酸汤子”中毒、惠来“粿条”中毒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辨别能力低是消费者主体最大的特征,发生问题时无法判断食品本身是否存在问题,不会轻易地加入食品安全共治队伍。此外,消费维权事件的投诉流程繁琐,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无法形成统一集体,对食品安全问题抱有“以和为贵”“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态度,让消费者失去维权信心,不仅不利于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共治,还会导致企业投机性生产不安全食品。

(4)行业协会

食品行业协会作为食品领域内的专业权威,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也是食品安全共治环节必不可缺的主体,当前主要面临缺乏内部治理机制和权责不对等两方面的困境^[25]。由于行业协会内部缺乏自律监督,普通会员很难直接参与协会的事项讨论与决策,实际管理部门为协会内部的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偏向于行政机关的运作模式,架空了协会权力,无法调动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积极性^[26]。加入行业协会参与共治需要付出成本,部分小型企业不愿意参与,行业协会表现出“精英治理”特征。此外,还有部分企业参与行业协会后不参与治理但是享受行业协会带来的影响,“搭便车”行为导致行业协会无法正常运转。

(5)媒体

媒体作为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媒介,是构建和谐人文环境的中坚力量,当前主要存在媒体效用最大化和逐利型本质两个方面的冲突^[27]。中国食品安全网和《中国食品报》等媒体的开通弥补了以往发声无平台的问题。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各类新闻媒体百家争鸣,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可以在各大媒体平台上快速流转。但由于媒体数量多、种类杂,各大媒体为追求效用最大化,追随热点并快速播报安全事件,消费者主体面临异常杂乱的信息,大幅降低媒体的群体可信度。又因为

部分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识别能力差,极易引起舆论和恐慌。此外,逐利型媒体为获取流量而进行短期追踪,对于食品安全治理的报道持续度低,无法产生持续的互联网效应,对于食品安全治理的效果持续性不强^[11]。

（二）多主体交互共治的困境分析

多主体交互是指食品安全共治的过程中各主体以互动协同模式参与,多主体交互的低效是食品安全共治发展所亟需解决的问题。多主体互动示意图如图3所示。通过分析各个主体的特征以及在食品安全共治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发现多主体低效的原因主要有利益驱动、信息不对称、权责混乱等三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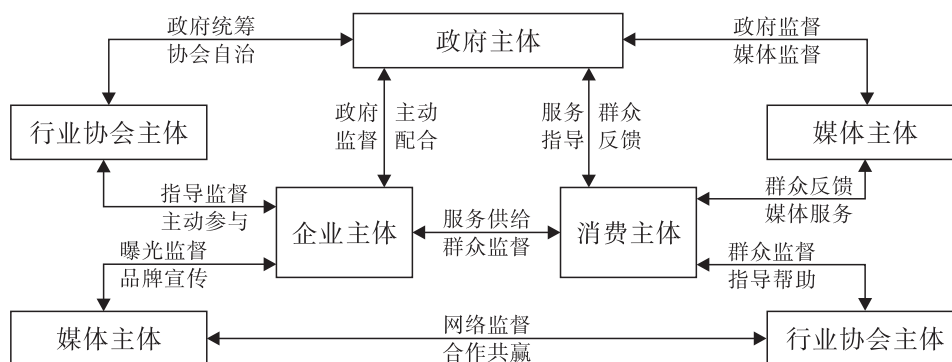


图3 食品安全共治多主体交互模式

(1) 利益驱动型交互困境

政府在食品安全共治过程中属于主导者,在监督、服务、激励等方面提供重要保障。但是,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导致主体间的交互效率较低。即使目前多主体共治在不断发展,政府治理的行政垄断现象仍然存在。政府部门在地方保护主义和绩效的多重标准下,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会被动沉默,处理结果避重就轻,消费者的治理周期漫长,极易产生主体间的信任危机,导致交互效率低效甚至无法运转^[27]。其次,企业的不配合是食品安全共治多主体交互低效的源头。食品的供给、抽检、溯源都必须基于企业出发,其他主体与企业的交互效率是食品安全治理过程的基础。企业具有利益需求,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故意拖延进展或者提供虚假信息,导致治理效率低下^[4]。此外,媒体和行业协会的利益追求也降低了多主体交互效率。媒体和行业协会在企业、政府和消费者三个主体之间进行协调,既可以通过监督指导提高食品安全的质量,也可以在利益驱动下为投机行为提供便利。当媒体和行业协会失去社会公信力,多主体交互效率会大幅下降。

(2) 信息不对称型交互困境

食品“从田野到餐桌”的所有环节都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社会资源的有限性无法实现全程监管,食品安全问题就存在投机性。食品安全共治参与主体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内容存在结构差异,例如企业主体掌握更多的食品信息、政府掌握更多的处理信息,信息结构差异使得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存在“可操作空间”,降低了主体间的合作信任和交互效率。政府通过信息不对称可以为部分企业“创租”“抽租”等行为提供政策偏向,这会产生“逆向选择”,即信息持有量多的企业利用其获得更多利益,从而使消费者购买到“高价低质”的产品。其次,食品安全治理属于事后处理,各地食品安全标准、抽检数据、监测情况具有独立自主性,而治理环节存在的滞后性问题给企业创造了应对惩罚策略的时间,无法发挥治理效果。此外,食品安全问题治理环节中媒体的关注对企业普

遍存在负面效应,会降低企业与媒体的合作概率,限制了媒体的信息来源,容易产生偏误、不及时等问题降低了媒体与其它主体之间的交互效果^[11]。

(3) 权责混乱型交互困境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消费者维权的渠道更加便捷。调查显示,2019年中消协接受投诉的比例较往年同比上升12%。但在现实中部分消费者缺乏责任意识导致存在恶意投诉事件,通过投诉为由与商家进行谈判,认为投诉后只需要等待政府或者其他主体的结果,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主体间的不信任^[2]。多主体交互共治要求各主体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缺乏责任意识导致主体间的交互效率下降。其次,行业协会是各企业法人自愿作为成员的非盈利性组织,主要协调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的服务、咨询和监督,但是现实中行业协会自身的独立性较弱,“半行政化”现象导致协会近乎于政府的附属组织,无法发挥协会应有的监督效果。行业协会的半行政化导致与协会的宗旨存在冲突,导致协会无意愿管理,在缺乏社会力量监督的情况下无法与媒体和消费者形成系统的社会监督体系。最后,媒体是社会舆论中心,报道的质量和深度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媒体通过报道加速了食品安全事件的网络传播,但是过度曝光、滥用公众媒体权力的现象不仅损害了企业的权益,还给社会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四、食品安全多主体共治交互机制的相关对策

食品安全共治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帕累托改进,核心在于政府一元制监管模式向多主体共同监管模式的转变,要求各主体愿意并且能够主动参与管理,并非政府简单的权力让渡或下放。理想型食品安全共治模式是社会各主体富有社会责任感,各司其职、互通共治,主体间高度信任,形成消费者安全有保障、政府具有权威性、企业具有信誉度,行业协会具有公正性,媒体具有公平性的安全稳定型社会。现实中垄断竞争市场、信息不对称等情况的存在导致市场无法自行实现帕累托改进。因此,本文通过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提出的“展望理论”,在食品安全共治面临困境的基础之上提出优化策略以提升多主体之间的积极主动性,增加社会总体福利的同时提高各主体的自身效用^[28]。具体如图4所示。

第一,利用大数据赋能,降低信息不对称。首先,加大技术投入,完善“互联网+食品安全共治”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的实际应用是食品安全共治的趋势,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完善数据收集、数据公开、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功能,为“互联网+食品安全共治”提供更优质的技术服务。其次,促进数据公开,打通主体间信息壁垒。大数据平台可以降低行业协会、消费者和政府获取信息的难度,大幅缩减成本,达到“一平台”即可“面对面”互动反馈的效果,极大促进各主体参与交互共治的意愿。同时,利用大数据平台公开推送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进展和治理结果,通过互联网“记忆”服务大众食品消费,为食品安全治理提供历史借鉴。最后,构建食品档案,打通食品流通产业链。大数据溯源机制是新兴的治理模式^[28],相较于以往成本高昂的溯源机制,通过对互联网食品档案的构建,可以在控制成本的基础上,明确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和问题环节。食品档案有利于治理环节的快速定位,有效降低企业“投机性”犯罪可能性,提高治理效率。

第二,完善奖励制度与交互平台,激发共治积极性。首先,完善奖励与管理制度,激发主体参与意愿。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共治奖励程度不高,且主要用于消费者举报奖励,成效低于预期^[24]。建议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给予行业协会和媒体监管足够的支持,促进主体发挥社会监督效应。对于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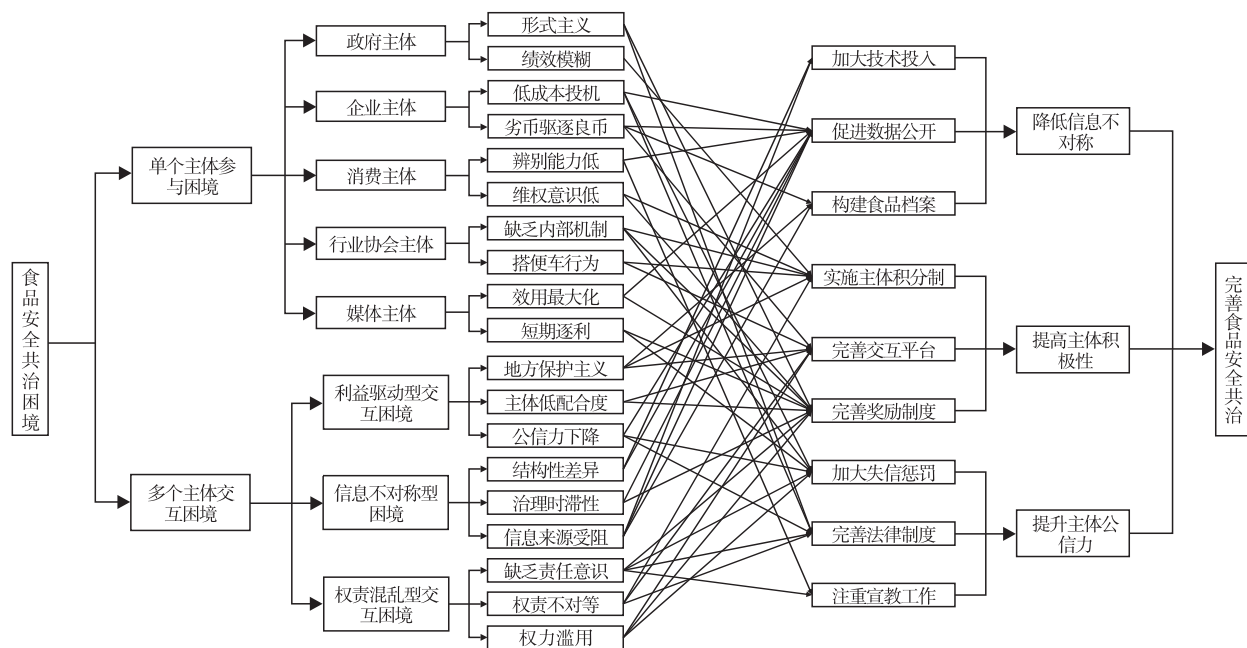


图4 食品安全共治多主体交互机制的相关对策

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企业进行政策倾斜,保障企业利益,促使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对于主动参与的消费者和媒体进行物质和名誉嘉奖,激发主动治理积极性,发挥群体效应。其次,完善交互平台,降低交互成本。提高主体参与意愿和交互效果的重要途径就是降低交互成本。利用大数据技术搭建主体反馈、治理、再反馈、监督一体化的互动平台,支持主体进行“云对话”,大幅降低主体的沟通成本和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成本。最后,构建主体积分制,提升主体交互效果。将主体参与共治的贡献度进行统计,并且定期针对性奖励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主体,同时对政府跨部门合作的内容进行成果划分,不规定具体时间、数量,改善传统治理的“中庸”思想。

第三,监督、惩罚、宣教协同,提高主体公信力。首先,构建失信档案,完善多主体相互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开发和完善信用体系,将违法行为和个人征信系统结合,发挥信息的“声誉”作用,让消费者选择对企业诚信经营形成倒逼机制。其次,加大惩罚力度,降低投机行为概率。失信成本低是失信行为频发的主要原因,“考虑到近23年的通货膨胀率,处罚金额的提高程度明显偏低,难以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起到震慑警示作用,不利于实现法律惩处条款对违法行为的阻却功能。”^[29]政府作为惩处机构,媒体作为渠道,行业协会和消费者作为监督主体,分别从行政处罚、网络曝光、行业处罚、联合抵制等方面应对企业的失信行为。同时,通过政府介入、社会群体监督对行业协会和媒体的失信行为进行惩治,督促其整改和解散。最后,创新宣教机制,促进主体交互效率。通过“传帮带”“大数据+红黑榜”等模式创新宣传教育机制,促进各主体掌握食品安全共治的内容,有利于激发主体参与意愿和提高主体交互效率。

〔参 考 文 献〕

- [1] 张蓓,马如秋,刘凯明.新中国成立70周年食品安全演进、特征与愿景[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1):88-102.
- [2] 刘飞,李谭君.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国家、市场与消费者:基于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J].浙江学刊,2013,

- (6):215—221.
- [3] 赵德余,唐博.食品安全共同监管的多主体博弈[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5):80—92.
- [4] Ivica, P. Food-security governance in India and Ethiop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9,40(4):743—762.
- [5] 王可山,刘嘉萱,崔艳媚.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研究的前沿热点和动态趋势[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4):35—44.
- [6] Gumataw K. A., Ali C., Mohamad G. A.. The effect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on food safety in the supply chain: Evidence from the Lebanese dairy sector: Governance and food safety in Lebanon[J].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7,97(9):2908—2918.
- [7] Megan B., Simon R. B., Alex M., et al. The role of traceability in transforming seafood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South[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16,18:25—32.
- [8] 康智勇,关晓琳,杨浩雄.网购食品安全协同治理体系探析[J].食品科学,2019,40(5):339—345.
- [9] 任芙英.供应链管理下食品安全的协同治理进路[J].河北法学,2019,37(9):140—147.
- [10] 张宏邦.食品安全风险传播与协同治理研究——以2007—2016年媒体曝光事件为对象[J].情报杂志,2017,36(12):58—62+33.
- [11] 周开国,杨海生,伍颖华.食品安全监督机制研究——媒体、资本市场与政府协同治理[J].经济研究,2016,51(9):58—72.
- [12] 徐国冲,李威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因素及治理路径——基于REASON模型的QCA分析[J].管理学报,2021,34(4):109—126.
- [13] 周广亮.协同治理视域下国家食品安全监管路径研究[J].中州学刊,2019,(2):73—79.
- [14] 顾小茜,陈永法.英国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调味品,2020,45(1):185—188+200.
- [15] Chen X. J., Wu L. H.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Food Safety Social Co-governanc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10:1387.
- [16] 张明华,温晋锋,刘增金.行业自律、社会监管与纵向协作——基于社会共治视角的食品安全行为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7,(1):89—99.
- [17] 杨丽贤,陈永法.加拿大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建设举措及启示[J].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20,32(1):57—61.
- [18] 何翔舟,金潇.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及其中国定位[J].学术月刊,2014,46(8):125—134.
- [19] 吴晓东.我国食品安全的公共治理模式变革与实现路径[J].当代财经,2018,(9):38—47.
- [20] 潘慧明.公共治理理论视域下的食品安全监管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13):147—148.
- [21] 伍琳.中国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改革:动因、进展与现存挑战[J].兰州学刊,2021,(2):72—86.
- [22] 龚强,雷丽衡,袁燕.政策性负担、规制俘获与食品安全[J].经济研究,2015,50(8):4—15.
- [23] 刘刚,郭利.从监管走向治理:食品安全实现逻辑的转变[J].江苏农业科学,2017,45(5):312—315.
- [24] 高凜.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困境与对策[J].法学论坛,2019,34(5):96—104.
- [25] 李季刚.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的优化[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1):131—143.
- [26] 汪亚峰,熊婷燕.行业协会参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探讨[J].江西社会科学,2020,40(9):224—230.
- [27] 罗珺,王帅斌,赵永乐.公众媒体参与下食品安全监管策略演化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4):88—96.
- [28] 黄音,黄淑敏.大数据驱动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耦合机制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9,(7):26—33.
- [29] 王建华,沈旻旻.进口食品安全监管的多维度解析与整体性治理[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1(05):5—15.

(责任编辑:闫卫平)

Analysis on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ulti-agent Interaction Mechanism for Common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ZHANG Li-guo, HUANG Lu-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As a people's livelihood issue, multi-agent interactive co-governance is the direction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We study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ood safety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isting food safety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found that the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involves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government, consumers, enterprises,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the media are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formalism, low-cost speculation, low awareness of rights protection, lack of internal mechanisms, short-term pursuit of profit and others, which lead to a decline in the willingness of individual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on governance.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mode between subjects reveals that multi-agent interaction faces such problems as interest-driven, information asymmetry,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confusion. By analyzing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ulti-agent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we put forward nin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from three aspects: reduc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promoting the enthusiasm of the subject and improving the credibility of the subject,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long-term and normalization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Key words: food safety; multi-agent; interactive mechanism; social common management

(上接第 11 页)

Dialectical Survey of Social Risks in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LIN Yu-hui

(School of Marxism,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6)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risk in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has become a symbiotic phenomenon. The harmonious symbiosis of all countries means that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benefit-sharing and risk-sharing is the background of risk generation.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ountries are interdependent, share weal and woe, respect the social existence of shared destiny, and establish a social awareness of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In addi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risk governanc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governanc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shared rights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meets the desire to fight against risk. In response to social risks, we should work toward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win-win cooperation. Therefor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rust and co-governance is the practical reason to eliminate risks.

Key word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ocial risk; dialectical unity